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

一、“十一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发现

考古学的研究资料来自田野考古工作。“十一五”期间的田野考古工作量很大,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然导致大量地下古代遗存被发现。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力量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一些从未登录的古代遗址同时被发现,为考古学界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但是真正有质量的资料还是来自那些有充分调研的,即通常所说带有明确课题意识的“主动发掘”的田野考古工作。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历年久远,很难保存下来。因此,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从来就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十一五”期间,有关旧石器早、中期的田野工作仅可举出浙江、云南等少数几项,大多数田野工作重点相对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上。在过去工作较少的天津,调查发现了27处旧石器地点,黄河两岸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的调查和发掘,又发现了数十处新地点,宁夏灵武水洞沟不仅系统发掘了水洞沟盆地西南边缘的第3、4、5三个地点,还在银川和宁夏南部等地发现多个新地点;对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持续发掘,发现了包括上下两个文化层在内的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下文化层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江苏连云港将军岩遗址,也发现旧石器晚期遗迹和遗物,出土了东部沿海地区地理分布位置最南的细石器遗存。此外,四川、云南、福建、黑龙江、吉林、河北、西藏、浙江等地,也发现该时期的遗存。

各地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工作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以宁夏灵武水洞沟、山西吉县柿子滩、陕西宜

川龙王辿、河南新密李家沟等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掘,十分重视新的科学发掘技术的运用和多学科合作,除详细记录遗物的三维座标,对全部出土物进行筛选,更全面系统地收集有关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外,还对遗址开展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的埋藏学、沉积学、古脊椎动物学、年代学等多学科综合分析。

在继续注重石制品的类型学研究、石器的特点和文化关系等等的探讨基础上,研究者利用石器拼合和操作链等概念和技术,着力探讨早期人类的行为特点、生存模式以及早期人类的分布、迁徙和交流等问题,并试图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特点、中国远古人类的发展演化特征等做出适当的解释。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十一五”期间,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继续成为重点关注的课题。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的持续发掘,为认识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特点和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材料。北京东胡林遗址的持续发掘,尤其是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的旧、新石器过渡期间的连续地层,以及早期陶器与细石器共存的资料,为讨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浙江浦江上山、嵊县小黄山^①、余姚田螺山^②等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发掘,则为进一步讨论早期水稻农业的特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聚落考古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得到重视。区域系统调查进一步普及,因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文明探源工程 and 大规模基本建设而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工作,不仅填补了地区空白,也为认识

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积累了资料。过去开展工作较少的贵州等地,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填补了缺环。重要的聚落考古发掘遍布全国大多数省区,从南海之滨的广东深圳咸头岭^⑬,到内蒙古高原的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⑭,从杭州湾南岸的浙江余姚田螺山^⑮,到横断山区的四川汉源麦坪^⑯,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重要遗址和墓葬的揭示,为建立更加丰满的中国史前文化体系,认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均提供了新的材料。四川新津宝墩龙山时代外城遗址、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大型城址^⑰、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晚期大墓^⑱、陕西高陵杨官寨仰韶文化环壕聚落^⑲、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⑳、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㉑、安徽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㉒等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十一五”期间,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多学科合作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得到进一步开展,无论区域调查还是发掘工作中都注意系统收集各种信息,更加注意以聚落为中心的整体研究。

(三)夏商周考古

三代考古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都城和城址方面。在城址考古的工作方法上,更多关注了遗址布局、功能结构等聚落形态问题。河南平顶山蒲城店二里头文化城址^㉓,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二里头文化城址。安阳洹北商城经钻探与试掘确认城址中南部存在宫城,面积约41万平方米。西南隅另有一小城,居民点多集中于宫城之外的西北和东北部^㉔。近年发掘宫城内2号基址^㉕总面积近6000平方米,与1号基址应属同一建筑群。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多条道路、大量祭祀性遗迹等重要现象^㉖,为殷墟都邑的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与这些大型城址聚落不同,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㉗是一座商代晚期的村落,发掘较为完整地揭示出聚落的布局,为研究商代基层社会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㉘陆续有重要发现,在系统考察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区和最高等级墓地陵园和普通墓地等关系的同时,还新出土大量刻辞卜甲,发现总字数超过了过去历年发现西周甲骨字数的总和,是研究周族历史和周人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㉙及其内

的夯土台基、贵族墓葬与车马坑、刻辞卜甲和带有“齐公”铭文的青铜器等材料,对研究齐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河南荥阳娘娘寨两周城址^㉚,始建于西周晚期,为以往发现甚少的西周城址增添了新的资料。而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河南濮阳高城东周城址,发掘者推测其应是春秋时期卫国都城遗址^㉛。此外,山东渤海南岸地区晚商至西周多达300余处制盐遗址的发现以及通过对其中若干遗址的全面揭露^㉜,首次了解到该地区应为殷墟时期商王朝的盐业生产中心。遗址高度密集和整齐划一的制盐设施,以及对其他相关现象的综合分析表明,这是一种国家行为,并为西周王朝继承,约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其生产组织系统才发生变化。这一发现为理解商人东进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线索。

“十一五”期间,三代王朝周边地区的考古也获得较多的进展。重要者可举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㉝、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㉞、福建浦城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㉟、湖北郧县辽瓦店子两周遗址^㊱、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㊲、云南大理银梭岛冶铜遗迹^㊳、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赤峰三座店石城遗址^㊵和二道井子聚落遗址^㊶、湖南永州潇湘上游商周时期遗址群^㊷的调查与发掘收获。这些发现,对研究当地青铜文化面貌、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东周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墓葬和陵园制度上的收获最为丰厚。山西曲沃羊舌墓地^㊸时代约在两周之际或稍晚,是一处晋国国君墓地,墓主可能是晋文侯,与夫人异穴并列合葬。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㊹保存完好,在周代墓葬制度及社会历史研究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甘肃张家川马家塬等战国时期戎人贵族墓地^㊺,随葬品极其丰富和具有鲜明特点,大量金饰和料珠等,皆指向通过欧亚草原与中亚乃至西方的交流。附近礼县大堡子山城址发掘和西汉水上游流域调查^㊻,既为早期秦文化探索和秦早期都邑研究提供了资料,同时也有大量反映秦戎关系的重要线索。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㊼结构特殊,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墓葬考古研究的内容,填补了有关钟离国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的空白。江苏无锡阖闾城^㊽的发现是吴国历史研究上新

增的重要资料。旨在整体探讨墓地陵园制度的考古工作还有河南新郑胡庄春秋郑国家族墓地、战国晚期韩国王陵^⑨等项目。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园^⑩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大致摸清了雍城秦公陵园兆沟内、外的整体布局结构及内涵。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⑪的钻探与发掘,推测应为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陵寝。湖北荆州熊家冢^⑫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全面揭露出一座由王墓、大量陪葬墓、特大型车马坑等组成的战国楚国国君陵园。

(四)秦汉以降的历史时期考古

1. 城市遗址考古

汉唐城市遗址考古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收获,主要是都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的考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开展。秦阿房宫前殿遗址附近的上林苑宫殿建筑群3、4、5、6号建筑遗址的发掘,证实大部分建筑基址为战国时期,有的沿用至西汉^⑬,这对厘清秦汉时期的上林苑布局具有一定价值。西汉长安城遗址陆续发掘了直城门、城内道路、桥梁等遗迹,丰富了以往的认识。其中对楼阁台遗址附近进行考古钻探中新发现两个东西并列的小城,应为建筑于旧西汉长安城东北隅的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宫城^⑭。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宫城,2008年,新发现北魏宫城2、3号建筑遗址^⑮,其中2号遗址为一座三门道的大型殿堂式结构宫门建筑,形制结构与阊阖门多有相同之处,这是继宫城正南门阊阖门遗址发掘之后的又一新发现。邺城遗址在发掘了东魏北齐佛寺塔基遗迹之后,进而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北朝寺院遗址,这对于邺南城平面布局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⑯。隋唐两京长安、洛阳遗址的考古在“十一五”期间发掘面积大、发掘遗迹类型丰富。其中对丹凤门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揭露该宫城门五门道的形制^⑰;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址以南地带发现宫殿式建筑、园林式建筑、防卫设施以及渠道、桥梁、道路等一系列新遗迹类型,为了解唐大明宫前朝部分和宫城制度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⑱。隋唐洛阳城确认出中心区宫殿建筑群中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夯土基址的叠压打破关系,为研究洛阳隋唐城宫城的平面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⑲。杭州中山中路南宋御街的发掘和皇城的范围也继续有新的发现。继河北张北县元中都发掘“工”字形宫殿基址和宫城南门、西南角楼遗址之后,在内蒙古正蓝旗也发掘了元上都内城明

德门(午门)和穆清阁建筑基址^⑳,为了解蒙元“离宫”性质的都城形制,作了有益的探索。

“十一五”期间,地方城址较为重要的考古项目有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大同北魏平城、南京三国至南朝建康城、太原北朝隋唐晋阳城、河南延津沙门古黄河渡口汉代至金元各时期城址、扬州隋唐至宋扬州城、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重庆合川抵抗蒙(元)的钓鱼城军事城防以及黑龙江汉魏时期炮台山城址、辽宁省高句丽中晚期的凤凰山山城遗址、湖北蕲春罗州城遗址的发掘等^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河南叶县发现的集镇遗址为我们了解中原地区集镇的形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2. 陵墓考古

“十一五”期间,相继出版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㉒和《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总结和公布了秦始皇陵园考古阶段性成果^㉓。西汉帝陵考古工作重点在帝陵陵园、陵邑总体布局上,通过大面积勘探、试掘等技术手段,对陵园的分布、陵园布局、陵寝建筑、陵邑形制等有了全面的认识^㉔。洛阳东汉帝陵也作了调查工作,获得了邙山陵墓群中东汉帝陵位置分布的重要线索^㉕。新发现汉代诸侯王级别的陵墓如安徽六安双墩汉代墓地1号汉墓,推测墓主为西汉六安国共王刘庆^㉖;湖南望城县风篷岭1号汉墓采用了“黄肠题凑”的葬制,推测墓主为西汉晚期长沙国王后^㉗;西汉中前期的山东青州香山“甲”字形大型墓也应当为同一级别的墓葬^㉘。这些发现对研究汉代诸侯王陵制度和地方史皆有重要价值。隋唐以降的帝陵考古有唐肃宗建陵和唐德宗贞陵的调查^㉙、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考古发掘、西夏六号陵园遗迹的考古工作,西夏陵基本上仿宋陵而作,但在许多方面又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除了帝王陵墓考古之外,还有大量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墓葬资料。

汉代墓地墓葬考古较为集中在西安、洛阳地区,在广东广州、广西、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山东临沂、甘肃河西、江苏徐州、山西北部等地区,也有不少同期收获。

汉代以后北方地区新出的重要墓葬资料有陕西西安凤栖原十六国至隋唐墓地、咸阳国际机场十六国隋唐墓葬、西安西兆余村唐秦守一石椁墓、宁

夏固原杨庄北朝墓、河南安阳固岸北朝至隋墓地、河北磁县东魏元祐墓、北齐高孝绪墓、河南洛阳北宋富弼家族墓地、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陕西高陵灰堆坡明代石室墓等^⑦。这些墓葬中有许多以前没有发现的新材料,如陕西韩城盘乐村宋代壁画墓墓内壁画以及木榻等遗物保存完好,壁画题材新颖,有关于中医药的画面,也首次在墓葬壁画中出现了释迦牟尼涅槃图。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有明确纪年,墓主人及子孙家庭成员形象共绘于一室,丰富了我们对宋金时期流行题材“开芳宴”中人物关系的认识。

南方地区新发现的重要墓葬资料有湖南长沙市桂花坪印山坡东晋墓、永州河西工业园汉晋古墓群、广州西湾路旧广州水泥厂南朝墓葬、江西宜春樟树村隋纪年墓等^⑧。其中旧广州水泥厂一带古墓葬非常集中,历年屡有发现,近年新增清理发掘的15座南朝砖室墓虽然大部分受严重盗扰,但M6、M10等墓内随葬器物完整保留,制作工艺精良,这为研究广州地区各时期墓葬的区域分布、分期提供了参考资料。此外还有四川彭山正华村北宋石室墓、南京江南区清修村宋代墓园、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氏家族墓。其中不乏大的家族墓葬,为研究这个时期的家族制度、丧葬习俗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3. 手工业遗址考古

“十一五”期间手工业考古的工作仍多集中在传统的瓷窑址方面,重要工作有浙江上虞尼姑婆山越窑址发现的三国西晋时期的瓷窑作坊,清理出1座龙窑和大量瓷器、窑具等,代表了当时青瓷生产工艺的最高水准^⑨。景德镇市西南丽阳乡五代瓷窑址出土了大量青瓷器,其始烧时间与景德镇市区湖田、杨梅亭五代窑址基本一致,对于宏观研究景德镇周边地区瓷窑发展史具有一定意义^⑩。四川崇州公议镇的天福窑时代为7世纪至8世纪初,值初唐至盛唐阶段,其发现丰富了川西平原唐代窑业的创建与发展的材料^⑪。其他南方窑址的发现还有浙江奉化下宅弄唐宋窑址、江西浮梁凤凰山宋代窑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江苏南京窑岗村30号明代琉璃窑址等。北方的河南巩义白河北朝窑址经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青瓷及少量白瓷,为研究中国早期白瓷的起源及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作为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白瓷

生产的代表性瓷窑之一,产量巨大,影响广远,该窑址的发掘在定窑的始烧年代、白瓷工艺技术发展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新资料。

砖瓦建材窑址的考古工作是“十一五”期间手工业考古的另一亮点。浙江宁波市马岭山的东汉时期制砖瓦窑为馒头窑,在浙江地区属首次发现^⑫。河北磁县南营发现了十六国时期砖瓦窑址,该窑址结构清晰,出土了大量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是研究十六国时期砖瓦建材制作工艺的珍贵资料^⑬。另在洛阳隋唐东都外郭城附近,曾多次发现隋唐时期的砖瓦窑址^⑭。

其他种类的手工业制作作坊有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制铁的烘范窑,出土90余套叠范^⑮。山西夏县师冯则发现了汉代末期私铸或盗铸货币的窑址^⑯。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浙江富安造纸作坊遗址的发掘工作,为我们认识宋代以来造纸技术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这些发现可以和文献中记载的造纸流程,尤其是竹纸的生产工艺相互印证。

4. 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遗址考古发现

“十一五”期间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领域的考古活动十分活跃,重要的考古工作有西安未央区窦寨村北周佛教石刻窖藏^⑰、隋唐长安城荐福寺浮图院遗址唐代夯土建筑基址^⑱、四川邛崃唐宋时期龙兴寺遗址^⑲、重庆市云阳县明月坝唐宋寺庙基址^⑳的发掘等。此外,太原晋阳古城太山龙泉寺唐塔基地宫^㉑、山东兖州兴隆塔北宋地宫、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及塔基地宫^㉒的发掘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考古工作。在边疆地区发掘和调查工作有新疆和田策勒的达玛沟佛寺遗址^㉓、西藏芒康、察雅吐蕃石刻遗存^㉔等等。

水下考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也屡有重要的发现。如对西沙群岛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抢救性发掘中,就获得了许多南宋时期的珍贵瓷器。

二、学科面临的问题与“十二五”规划建议

中国考古学在“十一五”期间,在研究技术、研究方法方面有了稳步和坚实的发展,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在包括旧石器时代欧亚大陆东西文化的传播交流、新石器文化及农业的起源、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过程、夏商周至秦汉帝国形成过程中古代族群文化、社会经济、社会制度的演

进变化,历史时期的城镇、手工业专题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成绩和进展。但随着学科深入发展和社会环境变化,学科也面临着若干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需要进一步加强重要薄弱环节的研究

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的研究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是非常基础的研究领域。但《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曾经指出:“尽管中国考古学文化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其内容的疏密程度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地区还很不平均,甚至还存在着一些空白。大略而言,各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很不平均,一些地区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工作,寻找、确认新的文化遗存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考古中,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还是颇为薄弱的环节,即便在考古工作最多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工作的区域或时段,例如华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十分不清楚的段落,四川盆地的早、中期新石器文化尚待发现;与中原夏代相当的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之文化也有待于进一步识别,等等。进入历史时期,由于有文献和文字资料的佐证可依赖,考古学角度的框架系统的建立反而长期以来被相对忽视。因此,基本材料的总结、归纳和基础框架体系的建立显得十分迫切。”但在“十一五”期间,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反而因为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带来对古代遗址面临破坏的危险越发加剧,完善考古学文化体系就更为紧迫了。

考古学对古代社会历史的复原与重建研究虽然已经开展起来,但同样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段,的考古学研究中程度大不相同。在那些考古学文化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建立得十分粗糙的地区,有关考古学文化背后社会历史内容的研究显然尚未提上日程。而不同时段,的考古学情况则如五年前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就已经指出的:“在史前和夏商周考古研究中,大多数依然是以传统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支持的,技术上偏重于定性分析而疏于计量统计,分类和描述依然是研究的核心,考古学文化的传统和时空界定仍然是研究的主线。……历史时期的考古长期以来忽视考古学在复原重建古代社会历史方面的独到作用,特别是对社会基层的组织结构、手工业生产的方式,组织形式,商品的传输范围及传输路线以及社会生

活、大众精神文化等领域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而在这些方面正是考古学在历史学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领域。”因此,“十二五”期间,依然有必要围绕复原重现历史与社会的主题,针对各历史时段的一些关键问题,精心设计组织一批研究课题,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带动学术发展。

(二)考古学研究技术的现代化和方法的科学化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如前面总结的,“十一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在研究技术的科学化、现代化和建设不同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体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从学科发展趋势的角度,从学科复原重建古代社会历史的目的要求看,这方面显然还有相当大的进展空间。加强自然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研究的有机结合,推动技术现代化和方法多样化,实乃需要各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三)加强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指出:中国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同世界考古学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但由于中国特有的历史人文背景,中国考古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脉络,其研究方法、理论也拥有自己的特色。加强对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温故知新,总结经验与教训,是保证学科健康发展的有效的办法。因此,《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提出了通过加强对考古学史的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呼吁。遗憾的是,这一呼吁并未得到积极的响应。在此,再次重申加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希冀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四)持续开展学风建设

提倡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和积极进取的学风。学风建设是一项长期和关系学科存续的任务。在历次学科发展规划调研报告中,都涉及了学风建设这个话题。“十一五”期间,学风建设的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考古机构普遍面临着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田野考古工作量剧增、压力过大的困境,自主开展的科研被迫压缩为最小乃至无。因此,田野考古工作中多现缺少主动课题意识、被动应付、不负责任、工作质

量粗糙低下等情况时有发生,久而久之,研究者个人乃至集体的科学进取精神也将被磨耗殆尽。与此同时,原本具有普及教育、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作用的学术成果经常被错位绑架到为发展经济服务的轨道上来,从而丧失了学术的严肃性。其结果,造成了考古资料不可挽回的损失,考古队伍科学精神的衰退,考古学科声誉的降低。尽管这些尚非普遍现象,但必须尽早提高警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纠正。

三、“十二五”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

考古学是通过大量研究成果的积累才能实现稳步扎实进步的学科。在《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提出过20项需要重点开展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都不能说已经完成,还有待于新资料的支持和大量不同研究认识之间的充分争鸣讨论。因此,考古学“十二五”期间的主要研究任务并未明显超出这20项课题之范围。兹将这些课题整理、调整如下:

1. 中国远古人类及文化研究

关于人类的起源,实际分为两个阶段的问题:距今200~300百万年间的人类起源和距今10~15万年以来现代人起源问题。国际上的主流观点是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东部,其后逐渐扩散至整个欧亚大陆,大约在距今10~15万年之间,现代人祖先再次从非洲扩散至欧亚大陆,替代了当地原有人类种群,并最终扩散到除南极洲之外的各大陆。但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境内较为丰富的化石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不支持这一主流观点。如何理解东亚地区的资料,将是解决有关人类起源不同假说争论的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

① 开展田野工作,继续寻找发现相关资料,尤其是相对欠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资料,建立更完整的发展系列资料。

② 运用DNA检测等技术,开展针对旧石器时代人类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③ 人类文化变化发展的形式、内容是了解和佐证人类体质演进发展的重要方面。开展对各时段人类遗址和文化的系统综合研究,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的研究,揭示文化和人的行为方式特征及其演

进过程,将对于理解人类起源、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传播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2. 旧、新石器文化过渡遗存的研究

最后冰期以来的环境巨大变化,迫使人类文化全方位调整,产生了包括生计方式和取食活动内容的变化、农业产生、居留方式从流动趋向稳定、磨制石器和陶器等新的人工制品的出现、精神观念的变化等等,人类历史遂进入新石器时代。现有资料业已表明,世界上不同地区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方式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有自己的特点。

当前对于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① 在若干重点地区开展田野工作,继续发现和充实考古资料,整理已有田野资料。

② 开展陶器、磨制石器起源及早期发展的专题研究。这些新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目前在中国华南、华北、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以及日本列岛发现的相关资料表明,东亚地区制陶技术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时间最早,局部磨制石器出现的时间甚至更早。需要通过对相关遗存进行精确年代测定,开展功能、型式和制作工艺技术的分类及其流变过程研究,从而复原东亚地区内部陶器起源的具体过程,探讨其产生的原因机制。

③ 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农业的独立起源地之一,有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两个区域,但二者在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关系尚不分明。目前,有关南方地区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考古资料有了一定积累,相关研究也呈现出从水稻遗存的种性鉴定转向通过区域环境复原和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对人们所利用资源的复原、人骨遗骸的食性分析等,探讨稻作经济的形成过程方面上来的趋势。“十二五”期间,应当继续加强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在“十一五”期间,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资料有了显著增加,从而有望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获得进展。

3. 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区研究

通过对各地区各时段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研究建立年代框架,通过对文化面貌的分析比较梳理其流变谱系,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领域,对于缺少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前领域,这类研究尤其重要。

① 旧石器文化的分区研究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南北两个工业传统的宏观框架已经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同意。随着近年来旧石器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应当逐渐建立内容比较细致的文化框架体系。在资料相对匮乏的地区,应将重点放在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方面。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定性描述,更应注重运用技术类型学、定量分析等方法技术,以更客观地总结不同地区文化特点及其发展脉络。

②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

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框架体系中,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段之间在资料丰度上不均衡的状况依然存在,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发现资料,填补空白和细化分期分区的认识。“十一五”期间,针对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研究范围尚局限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各地区以及一个地区不同时段的研究程度也不均衡,遗留问题应在“十二五”期间加以解决,这个范围之外的广大地区以及新石器早中期文化的年代学研究也应当陆续开展起来。

继续鼓励对考古学文化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例如从经济形态、产品流通或技术传播等角度对文化间关系的分析等等。

4. 史前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

聚落形态研究是复原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中国考古学的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50年代,但直到学科开始整体转向社会历史的复原研究后,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才逐渐蔚然成风,并且不仅局限在新石器时代考古,近几年的三代考古中也有所开展,而秦汉等帝王陵园之布局结构的整体调查,也可视为聚落考古的特殊形式。早在“十五”期间,聚落形态的考古研究就被列入重点研究课题,“十二五”乃至更远的将来,仍将是重点研究领域。

聚落资料来自田野工作,以发掘资料最为全面、系统和细致入微,是最好的研究资料。但全面揭露一个聚落周期长、投入大,且在政府管理部门强调遗址保护而对发掘申请的审批极其慎重的当前形势下,完全期望通过发掘获得聚落资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提倡尽量充分利用调查手段,开发包括各种遥感、物探等遗址勘查技术,以获得资料,辅之以适度发掘来验证调查认识和补充调查资料系统

性不够的缺陷。聚落群的研究以区域调查方法为主,也需要配合对聚落群中典型遗址适度发掘所获认识,以便正确把握调查资料。

聚落形态研究,即对聚落所反映的社会的复原,涉及方面众多,大致可分聚落经济技术内容及其与环境资源之关系研究;聚落社会组织结构研究;聚落社群的精神文化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要用到不同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是需要格外讲究的。

5.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呈加速度发展,夏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至有周一代,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思想道德、精神文化已经成熟,早期中国发展至顶峰和完备,此后演进蜕变,终于建立秦帝国,中国历史遂进入另一阶段。对于这个过程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课题,也需要将其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去看待。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学研究的内容贯穿整个“十二五”规划之中,研究范围自公元前3500年~前221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重点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和西辽河地区,长城地带等参与史前文明进程的主要地区,通过不同地区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过程的比较研究,总结概括中国文明的本质、特点和发展模式等根本性问题。但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因此在“十二五”期间,仍需要提倡开展有关这一主题的各种形式、内容和不同规模的研究。

后一阶段,重点研究夏、商、周三代氏族社会转向国家统治形态,完善政治制度,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意识形态垄断等方面的历程,阐明中国文明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等重大历史问题。进而说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这是一个极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① 国家形态的研究。尤其是夏、商二代的国家形态尚存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考古发现的丰富的城址,为研究其布局结构、流变及其从中体现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应注意城址与周边聚落的关系,也即“国”与“野”的问题。而对比龙山时代各地城址与二里头遗址等被认为是夏人的城邑,可望从两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化状况、生产组织和社会职能的复杂化状况、都邑营造制度之异同等方面综

合和深刻考虑夏的国家形态这一受到广泛争议的问题。

② 各种制度研究。在三代各种制度的研究中,礼制是核心问题。礼制本质上是互为里表的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物化表达形式,前者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决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后者是根据这种基本结构安排的财产、权利、义务乃至国家政权的分配与继承法,而礼制则是规范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各成员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定,涉及出行、燕饮、服饰、用器、宫室、营国、婚丧、礼宾外交等各个方面。礼制在西周发展成完备体系,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礼制通常可通过相关遗迹现象的规模等级、数量和质量表现出来,这正是考古学研究的特长,应当发扬光大。

6.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进入夏商,开始陆续有了文献的记录,因此,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古代民族背景的问题,较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复杂。同时,三代周边地区的情况又不似新石器时代者清晰。因此,考古学文化研究在三代考古中始终是备受关注的领域,“十二五”期间还很有必要继续予以充分的重视。兹建议以下述方面作为重点课题: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缘起过程,以及其处在文化并行期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虽然历时已久,但仍须关注;三代王朝文化与周边地区诸文化关系的研究,为历史上“九州”、“中国”概念的理解、重构上古历史分区以及周边集团与中原王朝关系等提供线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当前,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考古资料的积累很不均衡,制约着研究深入开展,需要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田野考古工作,抓紧已获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表。对这些周边青铜文化兴衰过程梳理的同时,其原因与背景也应予以适当关注;西周封建、诸侯国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构成整个有周一代社会运作的重要方面。从考古学的角度,首先从文化遗存中将各国别文化识别出来,进而梳理其演变脉络,是国别史研究的基础。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几个大国文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不均衡,中小国别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十一五”期间,有关资料有了新的积累,有望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7. 古代城市与村镇研究

城市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要领域。古代

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交流等等都在城市遗迹里有集中表现。

历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多经历了若干朝代使用和建设,相当数量者为现代城市所迭压,考古工作难度大、周期长,其田野工作方法本身,以及如何引用现代探查和测绘技术,提高城市田野考古水平,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① 长期以来,城市考古研究的重点是布局结构方面,需要考虑宫城和宫室、里坊、集市、道路、城门、给排水系统和城防等军事系统、码头和仓库等物资保障系统等。对于辽上京、元上都、统万城等早年废弃、保存尚好的城址,需要尽快组织力量详细勘察测绘,必要时应佐以适度发掘,全面获取资料。那些历时若干朝代建设使用的城市,由于地层堆积极其复杂和大规模发掘多受局限,努力廓清不同时期的遗存,确定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准确布局,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② 在厘清个案城市遗址的文化内涵、沿革变迁的基础上,开展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城市的比较研究,探索古代城市发展规律,是本课题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最好在尽可能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因此,从史前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现起,三代城邑发展、汉唐直至元明清代的城市,都应摄入研究视野。此外,“十一五”期间一些古代村镇的发现,为此项研究注入了新内容。将来类似的资料积累多了,就有可能把城市研究扩大为城镇网络的研究,这对于地方史的复原具有深远意义。

8. 古代墓葬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墓葬和墓地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是中国考古学历来最为重视的领域。“十二五”期间继续加强这个领域的研究非常必要。

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资料固然重要,然而一座完整的墓地所提供的信息绝不是所有墓葬资料信息的机械叠加,有关当时社会的大量信息还存在于这些墓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因此在田野工作中提倡全面把握一个墓地的工作方法,包括对陵园兆域内外的享殿祠堂等附属建筑的详细了解,历代帝王陵墓虽然出于文物保护的原因禁止发掘,但动用传统和现代技术对其详细勘察,当是必要和可行的。

不同时期、地区的墓葬有不同特点,反映了不

同历史背景内容,有不同的研究侧重。如新石器时代墓葬的研究中,氏族社会组织、社会分化等是引起关注的焦点。夏商周三代墓葬所见等级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三代礼俗的异同等是重要课题。当然,从各地埋葬制度、随葬品风格的不同所见区域社会文化或国别族属等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的课题。三代以来,经汉制到唐制,再历宋元明清,诸历史时期的墓葬制度因社会环境变迁有所演变,其研究重点应放在墓葬等级制度、墓地的整体布局、墓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及宗教观念的演变等方面上,以及关注墓地布局结构、风水堪舆、陵寝制度所反映的皇权、族属、等级和世俗观念等的变化情况,从中探讨相关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变迁。而丰富的文献史料可进一步佐证研究的历史结论。

9. 古代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① 见诸考古记录的手工业遗存有玉石器、骨角牙蚌器、陶器和瓷器、琉璃(玻璃)、砖瓦、漆木器的制作、铜、铁、铅、锌、金、银、锡、汞等金属开采冶炼和器具制作、舟船车舆的制造、以及制盐、纺织、造纸、酿酒作坊等,还有一些门类尚未见诸考古记录,但理应也存在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土环境,有不同的手工业门类和各时代或地区的技术工艺特点和水平,对此开展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梳理各自的进步发展过程,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研究进行得较详细的有玉器和瓷器、金银器等。其他门类如冶金、纸坊、酒坊等在“十一五”期间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在相关遗址有计划开展一些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尽快整理发表资料,可望取得与前几项比肩的成果。

② 手工业不但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直观写照,更是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置于社会经济的体系中进行考察,是手工业遗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面。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商周青铜器产源和流通、原始瓷的产地、晚唐以来制瓷业繁荣发展和产品外销等。但总的来说,这个方面的研究不多,深度不够。需要鼓励开展通过作坊遗址的分布、布局并结合史料以讨论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的研究,通过对重要商品运输通道及商品集散地的考古发掘资料对比研究,探讨产品流通贸易及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为目的的综合研究。

10. 古代佛教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大地上有数量众多的寺院、石窟寺遗迹,

但最近一段时间,佛教考古的开展并不兴旺。“十二五”期间佛教考古的任务依然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有计划地测绘现存石窟寺,加紧资料的整理,尽快出版正式考古报告;佛教寺院特别是中国早期佛教寺院布局、发展与演变的考古发掘、研究有待突破;单体造像的类型学研究要与石窟寺考古、佛寺考古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外来文化并传播广泛的佛教,对其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不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境内,还应积极开展其起源地的研究,以及经中国向外传播的研究。

此外,还应当进一步关注其他宗教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11. 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① 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张骞凿空西域以来,经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地带,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关这个方向上的重要贸易交流物资如金银器、玻璃器、丝绸等的专题研究,以及佛教、景教等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传播的专题研究长盛不衰。“十一五”期间的研究表明,随着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中西方交流有大幅度提前的趋势。中国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石叶技术,新石器晚期出现小麦、铜石并用时代砷铜合金的冶金术,商代的海贝、马车,新疆小河墓地欧洲人种的墓葬,甘肃张家塬战国时期西戎墓地发现的黄金饰品和料器等,皆表明中西方向的交流由来已久,而有关这些交流的专题研究,在“十二五”期间依然有继续深入进行下去的必要。

②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交流的另一研究领域,因水下考古发现的若干古代沉船,可初步勾勒出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一路向日本、一路向南洋诸岛、一路再进印度洋终抵西亚东非的大范围贸易交流的情况。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焦点在外销瓷方面,但据文献记载,茶叶、生丝、香料、铁器等,同为重要的流通商品。佛教和文化、科学技术向海外的传播则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此皆为需要深入开展的研究课题。

③ “十一五”期间,考古发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上游文化已经呈现出沿青藏高原东麓南下的文化态势,青铜时代,其影响已经明确到达滇西地区。于是,沿独龙江、怒江、澜沧江、红河向东南亚的陆路交流课题就被悄然提出了。建议有条件的研究机构或个人,在此方向上做些开创性工作。

④目前,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器物所见事实脉络的梳理上,这种交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经济后果,以及交流背后的文化、思想、艺术、制度等的传播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等,则是需要进一步阐发的。中国考古学既要解释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也要尝试解释中国之于东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于中国的问题。

12. 开展外国考古学研究

开展外国或境外的田野考古的工作刚刚开始。“十一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在走出国门方面跨出了第一步,先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外蒙古国及中亚、越南等开展了田野调查和发掘。但也应看到,这些最初的工作带有很多偶然性,缺乏长期系统的学术计划设计。“十二五”期间,可加强这个方面的主动性。开展境外田野考古,可先从邻近国家或地区开始,可先从与中国历史有关系的课题开始,逐步拓展。

(本报告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同意公开发表。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长:徐苹芳,副组长:严文明。执笔者:赵辉、陈星灿、许宏、朱岩石、杭侃、袁靖)

注释:

赵静芳、霍宝强:《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晚期遗址再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30日第2版。

尹申平、王小庆:《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1日第2版。

王惠民等:《水洞沟遗址第3、4、5地点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第26卷第3期,2007年。

李占扬:《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200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房迎三:《江苏省连云港市将军崖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文物出版社,2006年。

尹申平、王小庆:《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1日第2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2日第6版。

赵朝洪:《北京市门头沟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2日第6版。

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博物馆:《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b.蒋乐平:《上山遗址发掘记》,《浙江文物》2007年第2期。

⑪ 张恒等:《浙江省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第1版。

⑫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

⑬ a.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深圳咸头岭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6日第2版。b.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深圳市博物馆:《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⑭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发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1期。

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

⑯ 郭富、江任:《四川汉源麦坪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11日第2版。

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6年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期大型墓葬》,《考古》2007年第2期。

⑲ 王炜林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200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⑳ 张敬国、吴卫红:《含山凌家滩遗址最新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13日第5版。

㉑ 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

㉒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固镇垓下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9期,2010年。

㉓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

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中加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课题组:《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2005~2007年勘察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

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二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

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

㉗ 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7期。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考古发现与认识》,《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㉘ a.周公庙考古队:《岐山县周公庙遗址》,《中国考古

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b.**王占奎、种建荣:《岐山县凤凰山(周公庙)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c.**周公庙考古队:《岐山周公庙遗址去年出土大量西周甲骨材料》,《中国文物报》2009年2月20日。**d.**周公庙考古队:《周公庙考古工作汇报暨新出西周甲骨座谈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09年3月27日。**e.**凤凰山考古队:《岐山县凤凰山商周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②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

③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荥阳娘娘寨城址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9期。

③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3期。

③2 **a.**燕生东、兰玉富:《2007年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六期,2008年。**b.**李水城、兰玉富、王辉:《鲁北——胶东盐业考古调查记》,《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c.**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寿光市文化局:《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3期。**d.**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山东东营市南河崖西周煮盐遗址》,《考古》2010年第3期。

③3 王京燕:《柳林县高红商周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③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靖安县博物馆:《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2期。

③5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福建浦城县管九村土墩墓群》,《考古》2007年第7期。

③6 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东周遗存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4期。

③7 **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年第7期。**b.**毛瑞林、谢焱:《甘肃临潭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09》,《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增刊。

③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③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④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④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

④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坐果山与望子岗:潇湘上游商周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④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

④4 **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期。**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M28的发掘》,《考古》2009年第4期。**d.**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考古所、韩城市文物局:《陕西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西区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④5 **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b.**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c.**赵吴成:《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09》,《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增刊。

④6 **a.**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b.**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④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

④8 张敏:《阖闾城遗址的考古复查与初步认识》,《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八期,2008年。

④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⑤0 田亚岐、耿庆刚、袁文君:《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园遗址》,《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09》,《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增刊。

⑤1 张天恩、丁岩、侯宁彬:《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⑤2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⑤3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上林苑遗址三号建筑及五号建筑排水管道遗迹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3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阿房宫考古队:《上林苑遗址四号建筑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c.**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阿房宫考古队:《西安市上林苑遗址六号建筑的勘探和试掘》,《考古》2007年第11期。

⑤4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发掘》,《考古》2008年第9期。

⑤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新发现北魏宫城二号建筑遗址》,《考古》2009年第5期。

⑤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

⑤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7期。

⑤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以南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7年第9期。

⑤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河南洛阳市隋唐城宣政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4期。

⑥0 塔拉等:《内蒙古元上都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18日。

⑥1 a.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6~1998年考古勘探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c.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3期。d.国家文物局主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e.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宝清炮台山汉魏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6期。f.黄冈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总店编著:《蕲春罗州城——2001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g.李龙彬、司伟伟、崔丽萍:《辽宁丹东凤凰山山城考古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15日。

⑥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⑥3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⑥4 a.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b.杨哲峰:《渭北西汉帝陵布局设计之观察》,《文物》2009年第4期。

⑥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文物》2007年第10期。

⑥6、⑥8、⑦2、⑧0、⑧2 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⑥7 何旭红:《湖南望城风篷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

⑥9 国家文物局主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

⑦0 a.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河南安阳固岸墓地 区51号东魏墓》,《考古》2008年第5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磁县北朝墓群发现东魏皇族元祐墓》,《考古》2007年第11期。

⑦1、⑦4、⑧7 中国文物报社编:《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09》,《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增刊。

⑦3 故宫博物院等:《江西景德镇丽阳蛇山五代窑址清理简报》,《文物》2007年第3期。

⑦5 宁波市勤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浙江宁波市马岭山古代墓葬与窑址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3期。

⑦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磁县北朝墓群 M63 及十六国窑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7日。

⑦7 a.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外郭城五座窑址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2期。b.洛阳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瀍河西岸唐代砖瓦窑址》,《考古》2007年第12期。

⑦8 黄永久:《禹王城汉代烘范窑清理简报》,《三晋考古》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⑦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夏县师冯汉代窑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4期。

⑧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考古队:《西安小雁塔东院出土唐荐福寺遗物》,《考古》2006年第1期。

⑧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重庆市云阳县文物管理所等:《重庆市云阳县明月坝唐宋寺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

⑧4 龙真、冯钢、常一民:《太原太山龙泉寺基址发掘调查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9年1月14日。

⑧5 a.山东省博物馆等:《兖州兴隆塔北宋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1期。b.祁海宁等:《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暨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12月31日。

⑧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